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病中的父亲看到了,感慨万端。那时候,还不到 30 岁的他,被多年的肺病折磨得几近失去最后一点生活希望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个作家。但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庭的长子,战乱离难贫困拮据中,他只有屈服于生活,放弃自己的理想。三年后,他死了,死于肺癆,死的时候刚到 30 岁。

很长一段时日里,我并不知道从来只以商人面貌示世的父亲也有过这样一种当作家的“浪漫”,当然也更不能领会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傍晚,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感叹里所包含的全部感伤的意味。一直到那一年的那一天,我“热血沸腾”地和十万上海知青一道奔赴大西北农场去“战天斗地”,母亲把父亲 19 岁时发表的一些诗歌和小说,还有在抗战初期他流亡昆明一路所写的日记当做惟一的“遗产”放进我那十分简陋的行装里,我才震撼般地意识到,文学对于一个真诚的仁人,确实并不只意味青春期的理想 and 个人的浪漫。

我一直特别喜欢惠特曼的诗,尤其喜欢他的这一首诗:“我听见美国在唱歌……”他让我突然心悸。多年来我也一直在追问自己:你倾听中国在歌唱吗?你听见中国的歌唱了吗?你明白中国的歌声里所包含的那全部的感伤和沉重、幽思和期待吗?惠特曼在另一首诗里写道:“一只沉默而有耐心的蜘蛛,/我注意它孤立地站在小小的海岬上,/注意它怎样勘测周围的茫茫空虚,/它射出了丝,丝,丝,以它自己之小,/不断地从纱锭放丝,不倦地加快速率。”我愿意做这样一只文学的“小蜘蛛”,去网罗“中国的歌声”,去描画“中国的歌声”,并放大“中国的歌声”。有人告诉我,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之一,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能在文学史中有创造性的突破;既创造性地形成作家鲜明的艺术个性,又能在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和应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的意味,又洋溢着鲜活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而要做到这些,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去面对他们正在面对的 and 必将面对的一切。真正的文学也就产生在和人民一起为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巨大努力之中……这也就是在文学概论中经常要说的到的“艺术良知”和“作家的真诚”。而真要去实践这个了,我才知道,这等于把自己送进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烤箱”之中。或者还可以说,就像是在风雪弥漫的

■印象

东莞没有冬天

□韩作荣

有时候,不同季节的距离并不久长,只间隔着两小时 40 分钟。当我离开枯枝白雪,昏灰清冷的北方,踏上东莞的地面,由于飞行器下降的不适,耳朵还在肿胀的感觉中嗡嗡,眼前却是连绵的青绿,花团锦簇,有如北方的春天。

哦,这就是 12 月的东莞,下车伊始的第一件事便是赶快脱去紧身裹腿的棉毛丝麻,消消汗。换上衬衫和单裤,感觉便轻盈起来。吸几口清新的空气,嗅着若有若无的花香,看石壁倾泻的瀑布清流喷珠吐玉,顿觉心旷神怡,仿佛眼睛清亮了许多,呼吸也格外顺畅。

其实,东莞我曾来过多次。我在长安开过诗会,在石碣研讨散文,在观音山由陈铎主持与诸多的诗人、作家对话,皆为公事,匆匆来去的日子虽也领略了虎门的炮台、袁崇焕的故里,但似擦肩而过的路人,并没有看清她的容貌。只记得一个小镇就有多家五星级酒店,透露出其经济的强盛和富足。这就是同来的男人与女士大量购置衣物鞋袜,因为这里是诸多世界名牌的生产制造地,货真价实,价格也颇便宜。

这次来此却与往日不同,是一次松弛的带有疗养性质的观光,没有任务,为中国作协东莞东城区创作基地的人住着,如上,便有了闲情逸致,有了赏景的心情。这个时日北方正冷,海南过热。东莞却是温度适中 most 舒适的时候。如此的良辰胜景,如此的温暖惬意,没有杂事缠身,无忧无虑,小住十日,在此散心散步,尤益于养眼、养身且养心。

在东莞散步,我不是来看高楼大厦的,尽管这个地级市有近千万人口在这里拼搏、打工;尽管除了北京、上海,东莞是星级酒店最多的城市;尽管它的制造业拥有诸多的中国和世界第一。在我眼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它的现代工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植物园与花园一样的城市景观。

我曾无数次地到过南方,认识芭蕉、棕榈、荔枝、龙眼,也分辨得出榕树、广玉兰、剑麻、木麻黄、桉椰树之别。然而,由于这里的植物过多,我只能以询问弥补自己的无知。于是,我第一次认识了高高的树干光滑的大王椰;用手指捻碎阔柳树叶般的小叶桉树叶,嗅其独有的气味;捡拾落于树下的乳白的鸡蛋花;认知早已闻名花开正盛的紫荆花树……还有吐着火舌的扶桑,艳丽的三角梅,以及不知名的星星点点微小的花朵。12 月的东莞,仍旧是枝繁叶茂,花开次第的季节。

在我这个北佬的眼睛里,这里有颇多的叶片阔大肥硕的植物,芭蕉由于无力支撑蕉叶的重量而任其垂悬、开裂,也只有这般宽大的叶子才能生出雨打芭蕉天籁般的声音。油棕在丝缕缠裹中挺立,其间寄生着不知名的青蔓与蕨草,而那一蓬斜逸而出的青枝有如绿色的羽箭,在微风中摇曳,那么惹眼。于楼隙之中,我看到济公手中的蒲扇还在树上青绿着,蕴含着—树清凉的风。而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我也找到了它的母体,神话故事中的器物,原也在自然中生成。或许,正是这里的空气湿润,雨水多多,才有了那么多的植物生成,和天气的温热,阳光的充沛,得天独厚,才使得这里的叶肥果硕,四季皆为花季吧。在我的视野里,这里一般的树叶都比北方的树叶宽大。当然,这里也有小叶的灌木与乔木,与北方的树同属同种。可在北方盆栽的花木,在花盆高价出售,在这里却是司空见惯,杜鹃花,米兰之类竟在东莞被栽植成树墙,令人慨叹。在 12 月,树墙的杜鹃中仍偶有粉红的花苞探出,有米兰微小细碎的花朵,让人猜度花泛之时该是何等的绚烂美丽、流香溢彩啊。

在东莞东城的一条林带中行走,我领略了诸多树木于空间生长的气概,从老枝中探出,垂向地面,粗细相间,看来空气之中也能生长根须,一株树便能生长出一片树林,可见这空气中也有养料与滋养,也看得出生命的环境是如此适宜与美好,其萌发且生长的顽强。树隙的草地之上,有枯黄凋萎的落叶,枯叶上又有暗绿的落叶与凋残的花朵。而树上,老叶黛青暗绿,老绿之上又生出新绿,嫩嫩的带着微黄的鲜绿惹人喜爱,在暗绿之上更为鲜明。看来,东莞的树是边落叶边生长的,在一株树上,落叶是秋天,深绿是夏天,新叶是春天,它们同时存活于一株树上。东莞没有花颓香消,只留干硬枯萎枝叶的冬天。

前几年,我曾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赞赏杨克写的“在东莞的某处发现一小块稻田”的诗。认为这是小山村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独有的发现。而如今看来,诚然如是,但我也将并未熟识的东莞只看做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恐也是一种偏见。在人行道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只扭曲的蚯蚓,已在与泥土隔离的水泥砖块中死去。其实,路旁便是一片花草,如果它活着,我会将它送回松软的土地之中,因为在一个花园般的城市里,水泥钢筋与茂林修竹并非对立并怀着敌意地存在,而是浑然一体,工业和植物都是蓬蓬勃勃的生命,都有着最适宜生长的环境,并永不停滞地萌发、长叶、开花、结实……

在东莞,我还发现看不到泥土,凡有泥土之处都被绿叶和花朵所遮蔽,于枯萎之中再现新芽嫩叶,丰林茂草都在这里扎根。而那诸多的草根一族,几乎生遍了所有可立足之地,顽强地生长,给了东莞春日长新的新绿和清鲜的气息,因为这里没有冬天。

在林中流连,我看见一个小小的孩子正手持一枝上有飘浮的绒毛般的植物,张开小嘴轻轻地吹着。这不知名的类似蒲公英的植物的绒球在空中飘散,让我想到一个年轻的城市与它放飞的理想,以及它可预见的美好未来。

本版责编:冯德华

■创作随笔

我和我的父亲和我的文学三十年

□陆天明



2008 年,作者再访安徽小岗村



作者和父亲

冬夜里,把自己放在露天地里的一个大火堆旁,面对隐隐闪烁的星空,在极度灼热和极度寒冷的双重刺痛中,追索明日的朝霞,完善一个“自我幻觉”似的终端呈现……

为此,几十年来,我走过许多弯路,也曾真诚地放弃过自我,又曾极其痛苦地去寻回那文学创作中绝对不可或缺的“自我”,然后在新遭遇的困窘中,去拷问,你寻找回的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自我”?一个作家到底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自我”,才能有助于敞开自己灵魂慧知和激情的窗户,去倾听捕捉“中国”亿万民众发自心底的“声音”……

为此,几十年来,我也经受过许多的质疑,甚至屈辱。十几年前,我尝试写的《苍天在上》产生了为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预想之外的轰动效应后,一个平日子里比较相知的朋友却以一种很不屑的口吻问我:“陆天明,你觉得你这个东西能在中国热三个月吗?”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自己确

王笠耘同志,正像他的名字那样,是位戴着斗笠站在文学的原野上辛勤耕耘的人。我和笠耘同志接触不多,好像只在一次文学集会上见过一面。1988 年秋,他被中国作协评为全国优秀文学编辑,我真为他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笠耘的同事曾告诉我,他给人的印象是个为人方正、工作谨严、衣着整洁、谈吐儒雅的学者型编辑。这使我立即联想到了中国作协书记处的唐达成。像达成、笠耘这样的同志,我内心里对他们一直怀着敬佩的心情。

1988 年 6 月,王笠耘送给我一本《小说创作十戒》,并在扉页上工整地写着“守仁同志指教”的谦词。阅读这本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得悉笠耘是个有心人。他写了大量的读稿札记,把来稿中写得失败的关键段落—摘引下来,指出其缺陷和弊端,供写作者参考。他不迷信中外名著,讲出它们在结构上的某些败笔,引起作者的警惕。

《小说创作十戒》这部书,总结了他几十年审读作品的经验,使我这样的同行读来格外亲切。有许多问题,我也感到了,但没有像他那样作出系统的分析、清晰的梳理。该书《三戒·结构男分裂》中有一节《难寻难找的金丝线》,谈到有的作家有丰富的生命体验,积累了许多场景、细节、人物、生活故事,如果找不到一条金丝线把它们串联起来,那只不过是一堆散乱的素材而已。只有找到了那条金丝线,它们才可能从原料升华为一条精美的项链、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这段话完全说出了我在多年编辑工作中的体会。1987 年,有一位伊拉克盟的作家告诉我,他在内蒙古下乡插队劳动期间,储存了几个难忘的生活细节,比如房东女儿热恋着他、亲近他;秋天可到黄河滩上捡到大量鸟蛋;撑船时饿得吐酸水,船老大偷偷把喂马的黑豆给他吃;冬天的东莞,仍以结着厚冰的河面上开过去,船过激浪崖时如何惊心动魄……据此他想写一部名为《河路汉》的小说,可是鼓捣了五年也没写成。因为这几个难忘的细节、人物相互之间没有紧密联系。我听了就建议他用一条情绪线把这些零乱细节串起来。我说:“设想你现在要离开这个插队多年的地方了,你坐在黄河岸边,离别的情绪紧紧缠绕着你。因为惜别,你脑子里很乱,很激动,平时积累下来的一桩桩一件件难忘的事情素乱地涌上心头,出现在眼前。这时细节与细节之间不必渗透、连接,只要用离别的情绪把它们串起来,让每个细节都浸润着离情别绪,定会写出一部好作品。”根据我的建议,他超水平地作了发挥,写成了一部后来被文学教授作为艺术分析范例的佳作《红橄榄》。该书还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后他

实不知道三个月后中国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作品。还有个别从未写出过一本理论专著的“理论权威”打电话来,以当面污辱的方式,来表示对我和我这一类作品的轻蔑。

都是成年人啊。当时在我心底造成的刺痛至今仍是无法言说的……

我知道这些作品都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自己也还没有写出最想要的那一种作品。但是,路,必须继续走下去,也需要有人继续走下去。就像惠特曼当年在诗里写的那样:“每个人都唱着属于他或她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的歌。”况且,中国的巨变还在进行之中。对于“匹夫之责”,即使是作家,又岂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文学毕竟只是文学,作家也毕竟只是个“作家”而已,面对急需和永恒之间的齟齬,谁又能避免了“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的惆怅和“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的无奈呢?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合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家人)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一天比一天地更衰老……

前年,我回老家南通,到墓园看望了父亲。一个 60 岁的儿子去祭扫 30 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年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 30 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说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写出来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写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 30 岁的父亲早就了解自己这个 60 岁的儿子;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

■作者·编者·读者

我怀念笠耘同志

□张守仁

又被邀请到大洋彼岸作访问作家。

该书《八戒·生活实感弱》中《跳进小说里去》一节提到了我当责任编辑的《高山下的花环》。笠耘同志在书中说:“《光明日报》登过一条消息,报道新华书店选出了 1983 年十种最受欢迎的新书。其中,只有一本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这部中篇小说,从艺术上讲,并不是十分圆满的。它有个别落套的情节,结构上也有松散的地方,但是它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最主要的原因,还不仅仅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部队生活的矛盾,突破了陈旧的模式,更在于作者有激情,钻进了角色,冲进了矛盾冲突的火焰,使整个小说燃烧起来,令人热血沸腾。”他这段话十分精到地指出了《高山下的花环》在艺术上的不足和特别感人的地方。他说的也是我心里想说的话。

今年 3 月底,我和崔道怡去拜访刚从美国新奥尔良探亲回来的玛拉沁夫。谈到当代名编时,他首先提到的是王笠耘。他怀念笠耘同志对内蒙古作家的提携和帮助,并对这位伯乐深表感激之情。我想起了笠耘同志对内蒙古土地的热爱。记得他和冯牧、王蒙到内蒙古东北部采风时,看到扎兰屯的优美风景,赋诗一首:“六十条河绕青山,绿阴深处是扎兰,出门三步入画里,到此不再忆江南。”

王笠耘同志不仅是学养深厚、富有经验的编辑家,他在创作上也有丰富的收获。除了理论著作《小说创作十戒》外,他还出版过中篇小说《春儿姑娘》、长篇小说《她爬上岸岸》以及诗集《心花飘向远方》。

我始终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届领导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编辑家,他们是出版界的国家队,而王笠耘又是国家队的主力。像我这样仅属于地方队的一名编辑,一直把以王笠耘(包括在翻译文学著作方面我的恩师孙绳武)为代表的国家队作为我学习、敬仰的榜样。像笠耘同志那样德艺双馨、编创全能、中外文学齐熟悉的人才,在当代文学界、编辑界实属罕见。因此,活着的我们理应怀念他、追思他,铭记他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土地和生长

半瞧诗二首

□刘舰平

逝者如斯

——谨此祭献因诗而来、为诗而去的海子、苇岸们

川弓水似箭,射过流云空。
风追人字雁,日落满江红。
残月泛舟去,掉头又照东。
波隐洲如镜,浪子无愁容。
一跃成飞瀑,行峡美髯公。

苇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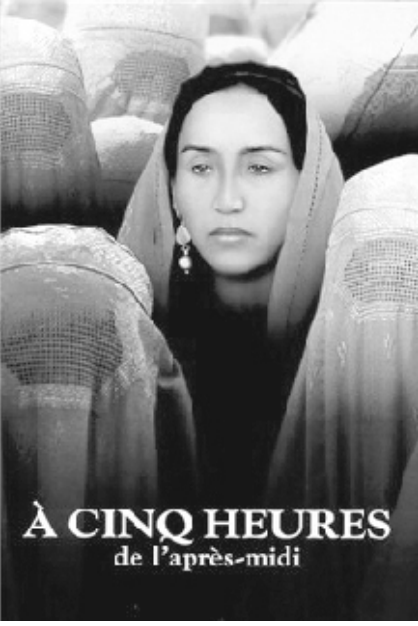
你伸出温初的手臂
夕阳就靠拢来

认定这是一段
可以托付的
地平线。
你在夜的泼墨中守护渔火
用含泪的苇叶
捧出鸟鸣
送给霜晨一片蔚蓝

你是一行清苦的诗
每个字都拖着亲人的影子
等候迷失的远帆。
蚂蚁 胡蜂 麻雀 车前草们
是你童心的伙伴
你与它们分享
二十四节气
一同打理大地上的事情。

你拒绝浪潮和泡沫
远离带有腥味的炊烟
三十九载的守望
你变成一道
有些荒凉的岸。
虽然你已睡去
仍不时飘出梦里芦花
清扫我们头顶的苍天

■天堂电影院



片名:《下午五点》

地区:伊朗

导演(兼编剧):莎米拉-马克马尔巴夫

这个导演年仅 23 岁,女。《下午五点》是她的第三部片子,前两部分分别叫《苹果》和《黑板》,拍处女作《苹果》时只有 18 岁。

伊朗导演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尊敬和惭愧。他们的创作,似乎并不惧怕所谓禁烟。好东西并不必然产生在“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艺术家是没有借口而言的。你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只能是由于懒惰和平庸。

这个 23 岁的伊朗导演,这次拍的是一部关于阿富汗战争 的片子。美国,塔利班,本·拉登,这些元素在片子里都有所体现,但是,它们甚至连噱头都不是。一部诚恳的电影是不需要噱头的。它们的出现只是因为它们是生活的一部分。

当“美国、塔利班、本·拉登”这些东西影响了人们的实际生活,人们的生活形态因此而发生改变,比如,参战的丈夫阵亡;比如,村庄和道路被毁,那么,人群中的大多数,只能无言承受和被动迁徙,人群中的大多数,体现出了本能而自觉的逆来顺受的能力。这种全民的逆来顺受里实在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但作者并不给这种生活附加任何东西,只是平静地加以描述。同样被平静描述的,是一段爱情。

“下午五点”,就是一首情诗的名字。我记不得任何一句诗了,但忘不掉那个男子的可爱模样。他爱上了一个想当总统的女子。他的知识,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显然比那个女子多得多。但是,他爱上了她,他爱上了她的无知,爱上了她的不着边际。他开始追求她。他教她如何做总统,教她如何在众人面前讲演。尽管他知道,她永远没有当总统的可能。他对她的欣赏里,有一点微微的嘲弄。而她不改其认真,看上去她实在是认真的,实在想当总统,实在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最后,她能够做的,只是迁徙再迁徙。一路上,马死了,马车用来取暖了。空旷的荒野里,马车燃起来时,我们不禁开始担忧:

还有什么可以取暖?

□陈继明

用《下午五点》取暖



孩子(油画)

〔德〕罗伯特·沃格尔

原上草

·第 104 期·

刊头题字:
臧克家